

文史說林百一集 正续编

(上册)

姜书阁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姜书阁 著

文⁻⁹⁰史說林百一集

正续编

(上册)

C52
J521

作者简介

姜书阁（1907.11-2000.12），字文渊，辽宁凤城人。满族。著名学者、国务院第一批享受国家政府津贴有特殊贡献的专家。生前为湘潭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湖南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税务学会顾问、湖南省劳动模范、荣誉社会科学家。一生著述甚富，已出版的有：《桐城文派评述》、《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中国文学史纲要》（上、下册）、《中国文学史四十讲》、《先秦辞赋原论》、《汉赋通义》、《文心雕龙绎旨》、《《骈文史论》、《诗学广论》、《陈亮龙川词笺注》、《说曲》、《松涛馆诗集》等。此次出版的《文史说林百一集正续编》（上、下册），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作者晚年的封笔之作，也是最能展现作者文史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原创性专题论著。

文史说林百一集

自序

或问曰：“先生之《文史说林》何以作也？”曰：非作也，盖集吾数十年中读书随笔之札批于眉边扉叶间者，今特加以甄选、考订、补缀、编录而成之耳。曰：“止此乎？”曰：非也。兹编所辑，盖以千言以上，八千言以下，且有所评论、考证、驳辩者为限；其篇幅过大、过小或独述己说，无所评论、考证、驳辩者，则不与焉。“然则，题曰‘百一’者，何也？”曰：幸其百有一得，一也；是集共收百有一篇，二也。非别有深义也。

尝谓向来学者多有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甚深：于其同者，或相标榜，或相阿附；而于其异者，则或相鄙薄，或相攻讦，一若不能共存者然。此皆无实事求是之心，故多强词夺理之论；逞意气，争高下，无益于学，有害于道，非所以昌明学术也。然而亦有心知其非，而不敢执言；或敷衍模棱，无所可否：是则学术上之乡愿，其有害盖尤甚焉。

余自童年读书，即好沉思，自求理解，不尽信师父之教；间于古人之成说，亦或致疑焉。及其长也，无论为学治事，皆喜独抒己见，自出心裁，不愿违心逆志，俯仰因人。用是之故，恒与世迕，然亦因此而稍能有所树立。其于学也，无论古之贤哲或并世闻达，吾固皆

崇而敬之，向且慕焉，未尝敢傲睨而轻之也。然虚怀请益，亦非无所用心而尽受之于人，必也精思独运，详考深究，辨其是非得失，而后有所采择焉。

此集百有一篇之《文史说林》，大抵十有七八皆驳难时贤之作。其始为之也，既不因其为我所敬爱之师友而有所回护，亦不因其闻望崇隆为举世推尊而有所避忌。论学不论人，倘亦西哲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者欤？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知我罪我，其何敢辞！

老尚未废，退而不休，爰编录此集，以谗于当代贤达。天假以年，犹将续有撰著。未敢预必，姑陈鄙志，以为异日之券。

姜书阁

一九八八年三月

目 录

自 序	(1)
1 黄帝纪年	(1)
2 文物考古有裨于古典文学研究数例	(6)
3 “王官采诗”之说不可信	(11)
4 “适人以木铎徇于路”不言采诗	(16)
5 《诗》之编选而为定本	(19)
6 驳“国风之大半不出于民间”论	(24)
7 《诗序》作者挟疑	(32)
8 关于《诗·卫风·硕人》的“螭首蛾眉”	(40)
9 《左传》与左丘明其人	(44)
10 孙武与孙臆两“孙子”各传其兵法	(51)
11 由孙武论及伍子胥	(56)
12 《孙叔敖传》与《孙叔敖碑》	(61)
13 陈澧说《论语》中“仁”字之义可取	(66)
14 程、朱妄改与误解《礼记·大学》	(73)
15 “从约成，秦人不敢窥兵关中”	(80)
16 屈原所钦仰之古代圣哲	(82)
17 屈原研究中之歧路	(86)

18	屈原屡赞伍子胥者何也	(93)
19	屈原放居汉北与陵阳问题	(99)
20	关于《楚辞释文》的迷雾	(108)
21	《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群书丽藻》作者不当是南唐 崔遵度	(115)
22	《离骚纂义》“按语”有欠斟酌	(118)
23	屈原自是屈原,不得代以“屈、宋”	(124)
24	“左徒”与“登徒”是同一个官职	(127)
25	屈原、宋玉的名字	(129)
26	《战国策·赵策》中之左师触龙	(134)
27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一篇“成相杂辞”	(136)
28	缺乏根据的一种解释“成相”之说	(145)
29	《尉繚子》兵书现存不伪	(148)
30	读《睡虎地秦墓竹简》联想	(153)
31	秦始皇刻石颂辞多三句为韵	(157)
32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	(161)
33	《太史公书》——《史记》	(165)
34	司马迁《史记》十表之创	(170)
35	隐书与连珠	(177)
36	刘安、王褒生卒年考	(182)
37	组赋	(186)
38	《文选》所收李陵《答苏武书》	(191)
39	晋《白紵舞歌诗》小考	(195)
40	《文心雕龙》与所谓“龙学”	(199)
41	何逊佚诗三首	(202)
42	騫公《楚辞音》与所谓“楚辞”、“楚声”	(205)
43	说“盐”与“艳”	(208)
44	李杜与风、雅、骚	(214)
45	杜甫赠李白“往往似阴铿”,岂轻之欤	(219)
46	李、杜皆盛称谢朓诗	(222)

47	《李白与杜甫》中的扬李抑杜论·····	(225)
48	《李白与杜甫》疵议·····	(233)
49	注杜诗宜博通举例·····	(238)
50	从杜诗《小寒食舟中作》论寒食节·····	(242)
51	元结、李商隐皆不尊孔·····	(246)
52	《文镜秘府论》之贡献如何·····	(251)
53	三韵律与小律·····	(255)
54	古文连用一字·····	(258)
55	韩、柳、欧、苏之于屈骚·····	(264)
56	柳宗元山水游记·····	(270)
57	欧阳修崇韩抑柳·····	(275)
58	关于李仲蒙其人·····	(279)
59	《宋诗选注》漫评·····	(283)
60	读《说杨柳枝、贺圣朝、太平时》一文·····	(291)
61	欧阳修十二月《渔家傲》鼓子词·····	(300)
62	《张子野年谱》辨误·····	(309)
63	南宋词人张孝祥生卒年考·····	(316)
64	吴则虞校点周邦彦《清真集》之疏漏·····	(324)
65	岳飞《满江红》词·····	(327)
66	歌曲语句不忘相袭·····	(330)
67	元人《天净沙》“秋思”小令的艺术渊源·····	(334)
68	《制曲枝语》作者黄周星·····	(341)
69	归庄的《万古愁》与贾应宠的《木皮词》·····	(344)
70	“兮”、“猗”古当读“阿”(啊)·····	(353)
71	“古无人声”与“古人未尝无人声”·····	(356)
72	《风雅逸篇》及“正杨”诸公·····	(362)
73	饮冰室论古歌谣及乐府·····	(368)
74	“关山同一点”与“绣帘开一点”·····	(376)
75	汉之“先令书”即遗命、遗令、遗嘱·····	(380)
76	马卿与葛武侯·····	(384)

77	古人自称字与自称子·····	(387)
78	说“先”、“生”、“先生”与“公”·····	(390)
79	父母称呼之异·····	(395)
80	唐以前佛家之文多作骈体·····	(400)
81	十六罗汉与十八罗汉·····	(404)
82	《四库提要》论述《佛国记》有误·····	(412)
83	房山云居寺《千人邑会碑》与《全辽文》·····	(414)
84	读元人周致中《异域志·东印度国》条所感·····	(417)
85	宋代广源州依智高年号·····	(420)
86	清代朴学家所言“为学三难”·····	(425)
87	引古人语须查明,切忌张冠李戴·····	(430)
88	汉人引《论语》每将弟子之言归之孔子·····	(434)
89	读书不解其义而误断句误引为证·····	(439)
90	点校古籍不可轻率从事——读点校本《咸宾录》·····	(443)
91	治学谈艺之文应力求浅显——读《谈艺录》补订本·····	(446)
92	因古今文学脱节而产生的谬误·····	(451)
93	“夜以继日”误作“日以继夜”·····	(456)
94	“楼台失火,殃及池鱼”,何处有此出典·····	(458)
95	巨(钜)万、大万,汉人皆谓亿·····	(461)
96	五雀六燕之权衡·····	(463)
97	古代蹋鞠之戏·····	(467)
98	驳所谓“纳兰性德第二次参加进士考试”·····	(474)
99	论纳兰性德的词·····	(480)
100	清代女词人沈宛——纳兰性德妾·····	(489)
101	《养吉斋丛录》所述八旗制度之误·····	(494)

1 黄帝纪年

据说清末在全国流行甚广的一本鼓吹革命的书曰《黄帝魂》者，编辑人署为“黄帝子孙之一个人”，其真实姓字是黄藻字菊人，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该书系辑录清季报刊中所发表的有关反清革命的论著而成。在那四十几篇论著中便收有原刊载于《国民日报》的《黄帝纪元论》。事实上清末有许多革命党人为了否定清朝皇帝诏颁的年号纪年，早已创立并使用过不少种独创的纪年方法。例如章炳麟就曾主张并实际用过以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为共和纪年之始。如他在《馘书》的《馘书前录·客帝匡谬》及《分镇匡谬》的篇末都有“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章炳麟曰：……”便是。也有一些尊孔的人，仿西历以耶稣诞生为纪元，便用孔子诞生的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 551 年）为孔子纪元元年。而更多的革命党人则是以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中华民族的远祖黄帝轩辕氏的降生之年为黄帝纪元元年。我曾考定，最早在光绪二十九年（公元 1903 年）便有刘师培署笔名“无畏”，在革命的报纸《国民日报》上发表了《黄帝纪年论》，并在文末开始用黄帝纪年，写着：“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书。”然而黄帝毕竟是中国古史上带有神话传说性质的人物，那时尚无文字，至少没有成熟的通用的足以用来记事的文字，故历来史家不能写出黄帝时较为具体翔实的历史。关于黄帝的生卒年，自然更是臆说，古籍记载不一，以此纪年，自多歧异。两年后，宋教仁据《皇极经世书》（宋邵雍撰）及乾隆官修的《通鉴辑览》等书，推定光绪三

十一年乙巳(公元 1905 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这就比第一个使用黄帝纪年的刘师培所推定的时间少了 13 年。是年《民报》创刊,便即以此署年,并在首页刊出悬拟的黄帝像。从此不少的革命报刊便都沿用这种纪年,甚至武昌起义所发文告也不例外。及革命党人在上海、武昌讨论成立共和制政府时,与会者公认过去这段时间使用“黄帝纪年”原属权宜之计;对于传说中的黄帝,“无论其功德如何”,究竟还是“专制政体之皇帝”,与民主共和的宗旨不合,且“年远代湮”,无可征信,遂决定放弃不用。因此,当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电告各省都督云:“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这便是正式宣告“黄帝纪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元 1911 年 12 月 31 日止,从 1912 年元旦起改从阳历,用民国新纪元。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姑无论就整个世界的形势来说,中国不应自外于全球文化交流体系而独用以夏历为准的黄帝纪年,即此黄帝本人也确实荒渺难考、无征不信的历史传说人物,更何从考定其生卒年呢?本来中国历史确有年次可考的,应从西周共和起,在此以前的一切历史年代,即皆不甚准确。今日各家所编《中国历史年代简表》对于夏、商、周三代,一般皆作:

夏	约公元前 21 世纪—约公元前 16 世纪
商	约公元前 16 世纪—约公元前 11 世纪
西周	约公元前 11 世纪—公元前 770 年

至于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之“五帝”,则皆列于不可稽考其年代起讫的原始社会中,而黄帝又为“五帝”之首,其在位之年犹难确知,更何论其生年耶?

司马迁《史记》虽以《五帝本纪》为首篇,明其“述往事,思来者”,是“自黄帝始”的,然而他在《自序》中却又说“于是卒述陶唐(按:谓尧舜也)以来,至于麟止(按:谓武帝至雍获白麟)”,其何故也?盖如迁在《五帝纪赞》所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縵绅先生难言之。”所以在他看来,五帝虽始于黄帝,但《尚书》则从《尧典》起,儒者皆传信之;至于百家所言黄帝,皆非典雅之训,縵绅先生

难言之，儒者或不传。太史公自谓已仅只据古文并诸子百家所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著为本纪书首”。

然而试观史迁在《五帝本纪》所著于书首的《黄帝纪》，固仍是没头没尾，无年代可考的。如云“黄帝者，少典之子”，少典又是何人呢？却未说明，只好等待后人若譙周、皇甫谧辈作注解说是“有熊国君”，才算有个着落。其下云：“姓公孙，名曰轩辕。”然而注家引皇甫谧言，说他“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这就难于判断，不知何者为是了。再下云：“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就是天生圣人了，不，竟是天降神灵了。再下来又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样，轩辕就乘神农氏世衰而自己起来用武力使诸侯宾从。继而有“蚩尤最为暴，莫能伐”，又有“炎帝欲侵凌诸侯”这两大严重问题。这时，“诸侯咸归轩辕”。轩辕准备解决炎帝和蚩尤，“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貔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解决了炎帝。“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就这样又解决了蚩尤。至此，轩辕始被诸侯尊为天子，成为黄帝，盖以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后又云“黄帝崩，葬桥山”，不言其年岁，更不记其在何年代。所以司马迁作《史记》虽始于黄帝，但后人实无从据以定黄帝纪年也。

如果从后世百家之书中寻觅关于黄帝轩辕氏的年代，则诸说纷纭：或曰崩年百十七岁，或曰百一十岁，或曰在位百一十岁，或曰在位百岁。究从何说以计其元年，盖难言矣。姑以清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计算，五帝时期，黄帝在位一百一十年，少皞在位八十四年，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帝喾在位七十年，帝桀在位九年，帝尧在位一百载，帝舜在位五十载。是自黄帝至舜崩禹继，共为五百零一年也。但他又在帝舜有虞氏末附注云“右唐虞二帝共一百五十二载”，是自黄帝至舜共为五百零三年矣。

班固《汉书·律历志》（卷二十一）载：“元凤三年（按：癸卯，公元前78年；元凤为西汉昭帝刘弗陵年号），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又言黄帝至元凤三年六千余岁；丞相属宝、长安单安国、安陵栢育治终始，言黄帝以来

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不与寿王合。”盖是时太史及言历诸家(凡十一家)所计黄帝以来年数已相差至三千年，汉以后人又何据以正之也？

《汉书·律历志》又言虞舜嬪(禅)天下于禹，“号曰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又言商自成汤“伐桀至武王伐纣六百二十九岁，故传曰殷载祀六百”；言“凡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是也。又言“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岁”。又云：“秦伯昭王本纪无天子五年。孝文王本纪即位一年。元年楚考烈王灭鲁顷公为家人，周灭后六年也。庄襄王本纪即位三年。始皇本纪即位三十七年。二世本纪即位三年。凡秦伯五世，四十九岁。”总计自夏禹即位为天子至秦二世之亡，共为一千九百七十七年。

上述《律历志》又言汉高祖伐秦继周，“著纪高帝即位十二年。惠帝著纪即位七年。高后著纪即位八年。文帝前十六年、后七年，著纪即位二十三年。景帝前七年、中六年、后三年，著纪即位十六年。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各六年，……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各四年，后元二年，著纪即位五十四年。昭帝始元、元凤各六年……”如此计算，则汉自高祖继秦为皇帝至昭帝元凤三年，共为一百二十九年。

假定依齐召南所制表，自黄帝纪元元年至舜崩之五百零一或五百零三年，再加《汉书·律历志》所著自夏禹即位至秦二世亡之一千九百七十七年，复加汉高至昭帝元凤三年之一百二十九年，则应得出“黄帝以来”共二千六百零七岁或二千六百零九岁之结论，不应更多于此。匪特“六千余岁”为虚妄，即“三千六百二十九岁”亦较此溢出千有余年也。

元凤三年为公元前 78 年，如用上述黄帝纪年计之，当为黄帝纪元二千六百零七或二千六百零九年。是清末革命党人以辛亥十一月十二日(即公元 1911 年 12 月 31 日)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八年者，实应为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九十五或黄帝纪元四千五百九十七年，相差尚有 13 或 11 年也。倘从清代段长基《历代统纪表》的年数计之，谓：黄帝轩辕氏在位百年，少昊金天氏在位八十四年，颛顼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帝喾在位七十年，帝挚在位六年，帝尧在位百年，帝舜在位五十载。则黄帝至舜之禅禹，共仅四百八十八年，则公元 1911 年 12 月 31 日的黄帝纪年当更少而为黄帝纪元四千五百八十二年了。然而以上这些算法还都是假定承认《汉

书·律历志》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的继世年数；倘或不然，而改依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所列：夏四百三十九岁，商六百四十四祀，周八百七十四岁，则又较上述所计多出近五十年，更不合了。

以上所引述的种种计算方法，还只是择其比较有古籍为据的主要几种，已是如此参差，其他异说更无须一一举述了。然而即此比较“雅驯”之言，若仔细分析起来，亦无一条不是可疑的。譬如从黄帝至尧舜号称五帝之七君，除帝挚外，何以都在位七八十年乃至百年，其长寿与在位之久，皆为三代以来四千年间所未有？这能说不是反乎常理的吗？这样的资料，其可信度究竟有多少呢？这年数既不可信，则由此而推出的黄帝纪年又有什么纪年价值呢！

然而我并不因此而否定作为中华民族四千余年前远祖的黄帝这样一个人物的存在，虽然他不一定就是有熊氏、就是姓公孙、就是名轩辕、就是什么少典之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后世纪传之史所必载的种种。因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学者大胆疑古，否定了数千年来封建儒人所世守的许多错误的乃至荒谬的长期流传的学说，虽然取得了摧枯拉朽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古代历史学开了新面，但也不能说没有否定得过多的地方，甚至把正确的东西也一古脑儿给抛掉了。即如，近年考古工作从地下发掘所得的实物，基本上已证明了被疑古者否定的夏代和夏代文化的光辉存在。而在夏前四五百年的黄帝时代，黄河中下游已进入考古学所定名的龙山文化时期，也完全会有古史所载黄帝时代所创建的文明。尤其重要的是四千余年来，中华民族所赖以维系繁昌、团结壮大者，亦未始非由于有这样一位作为整个民族智慧和力量象征的神人远祖黄帝轩辕氏供世代崇拜所致。陕西黄陵县西北桥山，史称黄帝葬地，至今有黄帝陵，历代按时祭祀，虽或出于后人附会，然而以此维系黄帝子孙的民族心理，自亦不可废也。

2 文物考古有裨于古典文学研究数例

研究古典文学，特别是研究先秦的古籍，经常有些问题前代学者或已有所发明，早就作出了正确的考订和论断，但由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造成了某些错误，相沿已久，习非成是，虽有正确的新见，只因拿不出实证，遂终不能为一般人所普遍接受。而一旦在文物考古的地下发掘中找到了有关的新证或旁证，于是前辈学者所作的正确考订和论断恰好得到了证明，然后这一问题才算完全解决并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

譬如《诗》、《骚》中的“兮”字，早在清代康、乾时期就有音韵学家订音，谓“古当读为阿”。这至迟在孔广森《诗声类》卷七“阴声一”“附 兮”中就完全说清楚了。其言曰：

附 兮 《唐韵》在“十二齐”，古音未有确证。然《秦誓》“断断猗”，《大学》引作“断断兮”，似“兮”“猗”音义相同。“猗”古读“阿”，则“兮”字亦当读“阿”。尝考《诗》例，助字在韵句下者，必自相协，若《墓门》“之”“止”同用，《北门》“之”“哉”同用，《采芣》“之”“矣”同用，皆“之、哈”部字也。“兮”字则《旄丘》、《君子偕老》、《氓》、《遵大路》皆与“也”同用。今读“兮”为“阿”，于“也”声正相类。又《九歌》“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天问》“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亏”字亦“五支”之当改入“歌、戈”者。《说文》本从“亏”，或从“兮”，未必非“兮”

声也。

近人闻一多在1939年写的《歌与诗》(据他自己注明“这是计划中的一部《中国上古文学史讲稿》的一章”)中便说过:

界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不错,“歌”就是“啊”,……古音大概是没有分别的。在后世的歌辞中有时又写作“猗”。(按:例省不录)……或作“我”:“有酒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诗·伐木》)……什九则作“兮”,古书往往用“猗”或“我”代替“兮”字,可知三字声音原来相同,其实只是“啊”的若干不同的写法而已。

而与此同时,郭沫若的《屈原》(后于1942年收入其《屈原研究》一书,为第一篇,题作《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之第二节,讲到“兮字古音当读如阿,关于这个字孔广森有一段很透辟的见解”,于是他便引了上述《诗声类》那一段话,并肯定地说:“这个见解是无可怀疑的。”

尽管如此,闻、郭两位始终不能说服受千百年错误读法影响的人们,使他们承认这一类的字(包括“兮”、“猗”、“我”、“也”……)实际就是“啊”、“呀”、“吗”、“哈”……当然他们更不会按照孔广森等音韵学家的研究成果来正读《诗》、《骚》等先秦古籍了。

然而,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甲、乙两种《老子》帛书,其中凡“兮”字都作“呵”,人们就不能不相信这一确凿的事实了。且看今本《老子》上篇第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帛书甲本此章属道经,在下篇,文云: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始(似)万物之宗。挫(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呵似】或存。……

帛书乙本此章当然亦在下篇,残缺较少。文云:

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渊呵怡(似)万物之宗。挫(挫)其兑